

* 學人介紹 *

歷史與思想及之外—— 余英時院士的學術成就

江 日 新*

在學術圈中，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說法，即「文史哲不分家」。不過在現今學術分工益趨細密的情況下，學者敢而且能優游出入於文史哲領域以名家者，我們卻不多見。有之，我們在此準備介紹的著名學者——余英時教授——正是顯著一例。

一、生平及學業淵源

余英時教授的籍貫為安徽潛山，民國十九年(1930)出生於天津。父余協中，曾攻讀於美國哈佛大學，治政治學及西洋史，並曾在香港新亞書院講授「西洋史」。余教授是在1950年離開大陸，前往香港探親，結果因他的父親要他留在新亞書院跟錢穆先生就學，因而奠立起他與錢先生逾久彌深的師生關係和一生學問的基礎。這個因緣依余教授本人的記載：

「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1950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平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平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裏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唸書。……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流亡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

* 江日新先生，本所臨時研究助理。

……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①

自被錄取入新亞書院就讀，一直到1955年秋天赴美，到康橋參加第二屆「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計畫」，余英時教授前後完成了他在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學業，其經過有如余教授之自述：

「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52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畢業生之一。」^②

余教授接著在：

「1953年錢先生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三、四個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由錢先生任導師。」^③

不過這一階段，依余教授本人的自述，乃是其個人生命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而這個關鍵亦即是在於他遇見了錢穆先生，他說：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没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④

①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發表於中國時報1990年9月26日人間副刊，文收入《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3—4。下文所引，以此書為準。

② 同上，頁8。

③ 同上，頁10—11。

④ 同上，頁13。

至於錢穆先生所以影響到余教授之處，依余教授本人的論述，我們看到除了有關治史方法和精神的指點提攜，以及人格上的交感之外，特別是在抗拒以「疑」「破」當作標榜並委然屈膝於西方流行學說的學風，而「一生為故國招魂」^⑥這一點上，更是促使余教授揭揚衛護錢穆先生終始不渝之所在。錢先生在這種「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⑦以存國魂或「中國歷史精神」^⑧上，「承繼了清末學人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接受他們的答案。……」^⑨而獨闢蹊徑地「針對著當時學術界共同關注的大問題提出一己獨特的解答」；^⑩並且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上，出入於經史子集而以「史學立場」為其最後歸宿和「超越觀點，使他能夠打通經史子集各種學問的千門萬戶。」^⑪在重建可信的歷史，並證國魂的不會亡等精神之感召下，余教授投身出入於中西文史哲的研究而終歸諸於其「史學立場」，貫串地統納入於其掌握中。

在香港期間，依前引余教授的自述，他主要興趣所在乃是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不過，除此之外，他「近兩年來（按指1953到1955年之間）思想的興趣集中在兩大問題上：一是文化哲學（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一是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⑫因此他在1950到1955這短短幾年中，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出版了《民主革命論》（香港：1953，臺北：九思1979重印）、《到思維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3；臺中：漢新，1984重印）、《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香港：1953）、《民主制度之發展》（香港：1954）、《文明論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自由與平等之間》（香港：1955）、《中國傳統社會人物批判》（香港，年代未詳）及湯姆遜（David Thomson）

⑤ 此處借用〈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1990年9月6日～7日聯合報副刊）一文標題；文收入《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至於有關錢先生對余教授在治史方法及史學精神的指點，前所舉二文可參見。

⑥ 同上，頁19。

⑦ 同上，頁20。

⑧ 同上，頁20。

⑨ 同上，頁23。

⑩ 參見〈錢穆與新儒家〉，收於同上書，頁35。

⑪ 見《自由與平等之間》（香港，1955）之〈自序〉；此書今與余教授所譯英人湯姆遜（David Thomson）《平等》（香港：人人出版社1953）一書合併，交由臺中之漢新出版社改題為《自由與平等》在1974年重刊於臺灣。同時重印的書還有《到思維之路》（1984）、《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1984）。

所著《平等》一書的中譯（香港：人人出版社1953）等書。這些書的著譯和出版，一方面印證了余教授此一階段對文化哲學和社會哲學的興趣；另一方面更令人感到驚訝於余教授的少年老成，竟能在這樣的年輕時代針對如許尖銳複雜的問題寫出如許多的著作來。

不過就作為一位歷史學者來說，余教授並沒有停留在這些「議論」上；相反地他同時在錢穆先生「自己的獨特『以通馭專』的道路」^⑫的薰陶下，將這些「文化哲學」、「社會哲學」的通觀與其精到的考證工夫配合，為日後幾項成績卓然的研究，預做了準備。

對余教授研究中國歷史薰陶最深的師承所自，依其自述，第一位當然是錢穆先生，第二位則是楊聯陞先生。^⑬而楊先生正是余教授在美國哈佛求學時的老師，至於他對余教授的重要影響，依余教授的自述，首先乃是他對學術研究窮追直索的質對批評訓練。即如余教授所說的：

「我到美國後，中國史的業師是哈佛大學的楊聯陞先生。楊先生既淵博又謹嚴，我每立一說，楊先生必能從四面八方來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無窮。」^⑭

楊聯陞先生淵博和精到的考證工夫在學術界中是赫赫出名的，而楊先生的這一歷史才識，余教授在追悼楊先生文中，更加以歸結論述：

「楊先生說：他的基本立場是『訓詁治史』，這裏『訓詁』一辭是取西方 Philology 的廣義，即徹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義，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緊史料的時代而得其本義。如果史料中有紛歧錯亂的狀況，治史者則必須運用各種方法加以整理。只有通過對史料的嚴格鑑定和精確理解，比較可靠的客觀史實才能建立得起來。這一層次的工作相當於中國清代以來的所謂考證，但也和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美國史學主流的取徑相近。……」^⑮

^⑫ 同註①文，頁10。

^⑬ 見〈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收於前引《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書，頁169。此文原是悼念楊聯陞先生逝世而寫的，原題作〈誰期海外發新枝——敬悼楊聯陞先生〉，刊於1991年1月20日~2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⑭ 〈從「反智論」談起〉，收於《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124。

^⑮ 同註⑬，頁183。

不過，如余教授所特別強調的，楊先生的這種史觀並不同如美國主流史學中的實證主義框架。他並不立虛構的「歷史客觀性」而由此客觀性以建構出歷史的真理或模型；相反地，他倒是同如「清代考證學源於經典文獻的研究，與西方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師法自然科學的模式大有不同：前者往往用詮釋方法以濟實證之窮；後者則與詮釋處於直接對立的位置。」^⑩

余教授與楊先生的學術過往開始於1955年秋天。當時余英時教授由港赴美，參加第二屆「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計畫」，及1956年秋起，余教授入學哈佛，便正式列籍楊聯陞先生門下：

「我正式做他的學生五年有半（1956年秋到1961年冬），後來又和他合教了九年的中國通史和中國制度史（1966—77，中間有兩年在香港）」。^⑪

余教授本人身列錢、楊兩位史學大師門牆之內，得到兩人的提携指點和質難問疑，更加以本人的聰資和努力，奠定了深厚的史學根柢。

余教授在哈佛攻讀，從1956年秋到1961年冬，共為五年半。其博士論文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經增訂修改後，於1967年由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

余教授自哈佛獲博士學位後，隨即受聘任教於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並得到該校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的三度補助（1963—1966），使他得能訪查多所美國的亞洲圖書館，更深入研究和增訂其博士論文，準備出版。至1966年，余教授轉任教於哈佛大學，他在哈佛任教共十一年，至1977年轉任教於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其間（1973年至1975年）他並曾出任為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余教授自1977年轉任教於耶魯後，一直到1987年離開耶魯改受聘為普林斯頓（University of Princeton）講座教授，他一直都是耶魯大學的歷史講座教授。余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一直任教至今。他並曾於1991至1992年榮任為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⑩ 同上，頁 185。

^⑪ 同上，頁 175。

余教授著作等身(下詳)，並且獲多項學術榮譽，計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等。

二、著作與學術成就

如前文所敘述的，余教授的著作等身，他早從青年時期出版《民主革命論》一書以來，至今已共單行出版了二十多本著作，其中有嚴謹的學術研究，也有針對時弊的讜論建言，更有發揚師門的情思謳贊。但當我們面對余教授這麼多內容廣泛且討論深入的著作，我們只能提玄鉤要地來介述他的學術成就，以下即以余教授的著作為核心作一簡述。不過在進行綜述余教授學術的各項成就前，且先讓我們就其各單行書及文集，稍略檢視一下其內容。

如同前文所提到，余教授自1950年來港就學於新亞書院起，至1955年離港赴美，他一共出版了《民主革命論》(1952)、《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1953)、《文明論衡》(1955)、《自由與平等之間》(1955)及翻譯《平等》(1953，原著作者及書名為 David Thomson, *Equality*, 1949)五種。這階段由其出版的文字來看，余教授所關心的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近兩年來思想的興趣集中在兩大問題上：一是文化哲學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一是社會哲學 (Social Philosophy)。」^⑮不過他在其史學專業中則主要是擺在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上，及他赴美就學於哈佛，他便將論述的核心集中於漢代的社會、經濟及知識階層和思想這些問題上。

余教授在攻讀學位以至在美國史學界展露頭角之初(1955—1967)這段期間，他的著作主要有增訂其博士論文而成的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以及與 Robert Irick 及 Kuang-Ching Liu (劉廣京) 合編的 *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 1784-1940: A Survey of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at Harvard, Research Aids for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Studies. Issued by Committee on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Studi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1960*，此外還有被哈佛大學歷史系收

^⑮ 同註⑩。

入 Harvard Seminar Papers (1948-1960) and Senior Honor Theses (1935-1959) 叢刊的 *American Old-China Trade, 1834-1844* (1959)。至於重要的論文則有〈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刊於《新亞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56年2月）；〈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刊於《自由學人》（1957）；〈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刊於《新亞學報》第四卷第一期（1958.8）；*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刊於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 (1964-65), 80-122。

余教授由於在研究上表現優異，因此在1966年又重回哈佛任教。自此以後，他便一直在執學界牛耳的大學擔任教職，造育不少英才。而他本人亦陸續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和論述出版，至今（除了前述各書外）共出了十八本單行著作，它們不但啓迪許多新一代學者的研究，並且也一直地激發出許多回應和研討。不過由於余教授這階段的文字較少以整書式的論述來進行，而是分別先以論文形式單篇發表，然後再滙輯成冊出版，所以書中內容豐富多樣，不能僅從書名予以把握。在此我們先將各書並其所收各文，分別予以列出，以便藉以尋檢和歸納余教授主要研究和論述的領域，以及評價其成就所在，以下即是依出版年代的表列：

1. 《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2. 《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
3. 《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本書收入以下各文：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1976）、〈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1976）、〈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1970）、〈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1975）、〈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1975）、〈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1957）、〈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1956）、〈史學、史家與時代〉（1973）、〈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1973）、〈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1960）、〈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1959）、〈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1958）、〈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1974）、〈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關於紅樓夢的作品和思想問題〉（1974）、〈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1958）。
4.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收入文章有〈近

- 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1974)、〈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1977)、〈敦敏、敦誠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1978)、〈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1974)、〈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述〉(1977)、〈《懋齋詩鈔》中有關曹雪芹生平的兩首詩考釋〉(1977)、〈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1976)及附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英譯：*The Two Worlds of "Hung-lou Meng"* (tr. by Diana Yu, 原刊於 *The Renditions*, 1974, No. 2.)。
5.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收入文章有〈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1956)、〈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附後記：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論」質疑〉(1959)、〈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轉變〉(1979)。
6. 主編及撰文：*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Han Dynasty Studies Delegation, October-November 1978*,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余教授所撰及參予討論的兩篇文章為 *Chines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及 *Daily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7. 《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本書收入文章有〈從史學看傳統——《史學與傳統》序言〉(1981)、〈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和展望〉(1979)、〈道統與政統之間〉(1981)、〈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原刊出時間待查，以下簡標「待查」)、〈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1979)、〈從「反智論」談起〉(1979)、〈從中國傳統看學術自由的問題〉(1975)、〈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1981)、〈說鴻門宴的坐次〉(1976)、〈方以智晚節考新證〉(1979)、〈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待查)、〈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1981)、〈顧頡剛的史學與思想補論〉(1981)、〈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待查)。
8.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4。
9.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除了同

- 書題的長文（爲胡頌平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作序）外，附錄收有〈《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及〈年譜學與現代的傳記觀念〉二文。
10.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4。本書收入〈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3）、〈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84）、〈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1958）及跋文。
 11. 《自由與平等》，臺中：漢新出版社，1984。本書合併余教授留港時所出《自由與平等之間》（1955）及翻譯 David Thomson《平等》（1953）一書重印發行。同時重印的舊作還有《到思維之路》（1953）、《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合併1954及1955年分別出版之《民主制度之發展》及《近代文明的新趨勢》二書而成）。
 12. 《方以智晚節考——增訂擴大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本書除舊版各文外，增添了〈方以智晚節考新證〉（1979）、〈方以智死節新考〉（1979）、〈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1985），另外在附錄部分增蒐了許多方以智晚年的詩文史料。
 13.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4.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此書收入有〈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原爲單行小冊）、〈意識型態與學術思想〉（1982）、〈再論意識型態與學術思想〉（待查）〈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1983）、〈儒家「君子」的理想〉（1985）、〈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1986）、〈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原稿曾在雜誌上發表並以專書形式印行）、〈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1983）、〈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1985）、〈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原以小冊單行）。
 15.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此書是選編自余教授在港臺所出各書中重要文章以供大陸學者使用之文集，其中收入有〈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1981）〈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兼論「俳優」與「修身」〉（1981）、〈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1986）、〈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1956）、〈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1959）、〈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1979）、〈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

16.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1988。本書所收文章有〈文化危機與趣味取向〉（1985）、〈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1983）、〈科技文化與大眾文化〉（1985）、〈文化建設私議〉（1984）、〈「五四」——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1985）、〈人文與自然科學應如何均衡發展——與吳大猷先生對談〉（1983）、〈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1984）、〈略說中西知識分子的源流與異同〉（1987）、〈「對塔說相輪」〉（1985）、〈「對塔說相輪」補篇〉（1986）、〈關於韋伯、馬克思，與中國史研究的幾點反省〉（1987）、〈翻譯與外來觀念〉（待查）、〈中國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1982）、〈廣乖離論〉（1987）、〈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1983）、〈一葉知秋——中共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始點〉（1985）、〈衝決極權羅網的「反思」〉（1986）、〈虎年說「虎」〉（1986）、〈陳寅恪的「欠斫頭」詩文發微〉（待查）、〈文史互證·隱顯交融〉（1984）、〈跋新發現的陳寅恪晚年的兩封信〉（1987）、〈「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待查）、〈欲超勝負入中年〉（待查）、〈「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1985）
17.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本書與1987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所出同名書的內容並不一樣，此書一如前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樣，都是編選自港臺所出名書重要專文而成的。其詳目如下：〈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1981）、〈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1976）、〈從中國傳統看學術自由的問題〉（1975）、〈儒家「君子」的理想〉（1985）、〈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1970）、〈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1975）、〈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1983）、〈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1974）、〈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1979）。
18.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內收文章有：〈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1990）、〈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1990）、〈錢穆與新儒家〉（1991）、〈《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附跋語）〉（1954）、〈《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啓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1990）、〈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1991）、〈中國近代思想

史上的激進與保守〉（1988）、〈《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1974）、〈壽錢賓四師九十〉詩（1984）及附錢穆寄余教授論學書三帖。余教授除了上述各書之外，另外還有一些英文文章未蒐輯成冊，茲再擇要錄之如下：

1. 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 (1964-65), 80-122.
2.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 S. XI (Dec. 1975), Nos. 1 & 2.
3. Han, in: K. C. Chang, 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3-84.
4. Toward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 (1980), 2. 115-125.
5. The "Philosophic Breakthrough" and the Chinese Mind,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3 (1985) 151-184.
6. 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7.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1987), No. 2. 363-395.

以上是余教授之著作的一個簡略表列。由這個表列，我們大致上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即：在史學的研究上，余教授所特別專注的是漢晉^①一段以及明末清初^②一

① 例如其增訂博士論文而成的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及論文如 *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1964)，"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1987)，以及在張光直編的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一書中負責寫作漢朝一段等，此外有關討論反智論的文字中亦多有涉及到漢魏晉這一階段的思想研究。（特別可參見《歷史與思想》中所收入相關文字。）

② 例如《方以智晚節考》（1972）、《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各書，以及收入於《歷史與思想》（1976）等文集中的許多文字都是屬此。另外有關論述曹雪芹的文章，在某種意義上亦可算作此一範圍的核心文獻。

段，而就主題上說，則是專注於知識階層與社會經濟互動上的所謂「知識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或德文 Wissenssoziologie) 這樣的進路。^② 特別是他能把握到一般從事知識社會學的學者所常忽略的「歷時性」——即歷史——因素。事實上，不管現代所謂「年鑑學派」或其他求新求變的史學理論為如何，一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在其所處的時代，以及其在歷史上所塑造的「作用史」(Wirkungsgeschichte——且讓我們借用一下解釋學術語上的字面意義)，無疑地還是具有相當「主導性」的地位；因此思想史的研究——特別是作為社會菁英的知識階層的研究，正是最能為我們正面揭示出此中關鍵的進路。而余教授之所以特別能為我國史界開一生面，也許正就是他能在從一開始即由「社會哲學」、「文化哲學」的浸潤之中，並在一種人文情懷、文化情懷的關懷下涉入「傳統的現代詮釋」。因此，即使余教授所從事的是考證工作，也仍然充滿著人文精神的深刻感動，而不僅只為專技的精巧表現而已。正如同我們若能仔細依循著他對方以智的晚節、曹雪芹的文學寄寓以至陳寅恪的晚年心境的考察索隱，我們便會發現到貫串在中國知識階層背後的「人格精神」究竟為何。當然余教授亦正是由此一特別洞見而能看穿戴東原與章實齋之依違於思想、考證之間的虛虛實實，和接上柯靈烏這位新黑格爾主義——當然亦因此而是能有所見於「精神」者——的史觀。

另外一項使得余教授在臺灣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史學者和思想家，這正是要推他將中國的思想傳統軌化為一種主智——反智^③的交互作用史。對於他的這一個思想史模型，臺灣曾因而引發一場熱烈的討論，並且至今仍有餘波未了之勢。不過，有關這種解釋歷史的理論模型——它正如源遠流長之「對立的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Nicolaus Cusanus 術語)的世界觀理解一樣——我們是很難給予一

② 余教授在行文中多次引用了 Karl Mannheim 的著作，不過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其對中國知識階層的探討，以至其所薰陶底蘊的文化哲學考慮，我們似乎更可以以 Max Scheler 在1924年領導編輯其始創「知識社會學」的原初構想為進徑的準據。詳請參見其所編的 *Versuch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München 1924。

③ 主要論文為〈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1976)、〈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1976)、〈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1970)——以上收於《歷史與思想》(1976)，此外如〈從「反智論」談起〉(1979)及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1975) 及 *Toward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1980) 等都是。

語道斷的。但無論如何，它的提出，確實是為國內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史學者或哲學家，提供了一些新的考慮視野。

余教授除了史學專業上的成就如上述外，事實上從一開始起，他的學問同時亦展露出他對現實的關懷。他不但積極地探索「民主革命論」、「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並且即使在探討「文明」而加以「論衡」或尋繹出其「新趨勢」時，也隨處地流露出他對中國政治前途的關懷；並且即使在三、四十年後，他亦不忘隨時為國人提供針砭、方劑。尤其在最近的寫作中，更見其苦口婆心（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一書所收各文。）

至於余教授最近幾年來在學術上最為人所稱誦的巨構，則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一專書。他出入於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理論等，企圖從而揭顯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真正可能因素，並且分別給予經濟動機、宗教動機、倫理動機以及文化機制一個適當的地位。他這一個工作實屬草創，借用了不少韋伯的論點，也對韋伯做了不少批評，特別在面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許多傳統的陳見，更是值得一一再予以檢討。而主宰著近乎百年的韋伯「社會」史觀，於今在余教授這本正面與之回應的著作出版後，也必定會有一場漫長的交接迴應吧。不過在「歷史」與「社會」之外，究竟「思想」將要作如何的安排？也許一種透過主體之自我意識的自我轉化或成就，才會是有所「行動」而實「實現」之的「思想的思想」。那麼，「歷史與思想」的結合，當更能夠給予人在其世界——特別是歷史世界——一些光明的指引。（本文曾經周大興先生代為潤飾）